



朱玉麒 主编

罗布淖尔考古与楼兰—鄯善史研究
简论西汉和新莽时期龟兹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
论西域出土的楚式刺绣
丝绸之路上的鸭头勺

王炳华
张德芳
周利群
高启安

新疆吐火罗语写本及其佛教文献
玄奘、义净法师的译经与龟兹壁画内容解读
佛教传入于阗的传说与史实
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北宋纪事石碑碑文及
于阗僧人法藏事迹初探
摩尼教十天王考：福建霞浦文书研究

皮 诺 撰；耿世民 编译
霍旭初
广中智之
李吟屏
马小鹤

清代新疆史的研究现状及其应关注的一些问题：
《新疆通史·清代卷》绪论
《新疆图志·建置志》的成书及版本研究
萧雄及其《听园西疆杂述诗》研究
人口流动与清代乌鲁木齐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齐清顺
蒋小莉
吴华峰
贾建飞

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霍恩勒文库”附
新疆考古通信研究
吕德斯与西格追思
林藜光追思
瓦尔特施密特教授及其对新疆古代语文学及
艺术研究的贡献
德洛夫及其突厥学研究
突厥学文集》1951~2009年篇目译介
疆探察及早期中古突厥语写本的发现

王冀青
瓦尔特施密特 撰；刘震 译
戴密微 撰；潘涛 译
耿世民
张铁山
张铁山
土谷舍娃 撰；杨富学 张海娟 译

哈扎诺夫 撰；贾衣肯 译

西域文史

【第五辑】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Literature & History on the Western Region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西域文史

(第五辑)

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Vol.V

朱玉麒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西域文史》是由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创办的学术论集，本辑发表与西域相关的学术论文 21 篇，内容涉及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学术史等方面。

本书适合于从事西域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域文史 (第五辑) / 朱玉麒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30424-7

I. ①西… II. ①朱… III. ①文史资料 - 西域 IV. ①K294.5②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3182 号

责任编辑：孙 莉 郝莎莎 / 责任校对：纪振红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邱 炯 陈 敬

封面题签：冯其庸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 × 1092 1/16

201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2 3/4 插页 2

印数：1—1 800 字数：540 000

定价：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西域文史》编委会

主编 朱玉麒

编委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列)

- 陈开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广中智之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贾丛江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李肖 (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暨吐鲁番学研究院)
刘安志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孟楠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施新荣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王欣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王东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王启涛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姚崇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于志勇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余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张铭心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
赵莉 (新疆龟兹研究院)
朱玉麒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英文编审 王媛媛 蒋小莉

目 录

罗布淖尔考古与楼兰一鄯善史研究	王炳华 (1)
简论西汉和新莽时期龟兹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	张德芳 (21)
论西域出土的楚式刺绣	周利群 (31)
丝绸之路上的鸭头勺	高启安 (43)
新疆吐火罗语写本及其佛教文献	
皮 茂 撰；耿世民 编译	(65)
玄奘、义净法师的译经与龟兹壁画内容解读	霍旭初 (75)
佛教传入于阗的传说与史实	广中智之 (87)
山东兗州兴隆塔地宫北宋纪事石碑碑文及于阗僧人法藏事迹初探	李吟屏 (105)
摩尼教十天王考——福建霞浦文书研究	马小鹤 (119)
清代新疆史的研究现状及其应关注的一些问题	
——《新疆通史·清代卷》绪论	齐清顺 (131)
《新疆图志·建置志》的成书及版本研究	蒋小莉 (159)
萧雄及其《听园西疆杂述诗》研究	吴华峰 (183)
人口流动与清代乌鲁木齐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贾建飞 (205)
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霍恩勒文库”附新疆考古通信研究	
王冀青 (219)	
吕德斯与西格追思	瓦尔特施密特 撰；刘 震 译 (243)
林藜光追思	戴密微 撰；潘 涛 译 (255)
瓦尔特施密特教授及其对新疆古代语文学及艺术研究的贡献	耿世民 (267)
拉德洛夫及其突厥学研究	张铁山 (273)
《突厥学文集》1951~2009 年篇目译介	张铁山 (281)
新疆探察及早期中古突厥语写本的发现	
土谷舍娃 撰；杨富学、张海娟 译 (303)	
《游牧民与外部世界》第二版导言	哈扎诺夫 撰；贾衣肯 译 (311)
《西域文史》第五辑著译者单位及文章索引	(351)
《西域文史》简介与稿约	(352)

Contents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Loulan-Shanshan and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s on the Lop Nor	Wang Binghua (1)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Kuča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XinMang Peri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uča and Han	Zhang Defang (21)	
Embroidery in Chu Style Discovere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Zhou Liqun (31)	
Duck-head Spoon Found on the Silk Road	Gao Qi'an (43)	
The Tokharian Manuscripts and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of Xinjiang G. Pinault (tr. Geng Shimin) (65)		
The Buddhist Sutras Translated by Xuan Zang and Yi Jing and the Decipherment of the Mural Contents of Kuča	Huo Xuchu (75)	
Legends and Truths;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to Khotan	Hironaka Tomoyuki (87)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Unearthed from the Underground Palace of Xinlong Pagoda of Yanzhou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Khotanese Buddhist Fazang	Li Yinping (105)	
On the King of the Ten Heavens of Manichaeism	Ma Xiaohe (119)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n Xinjiang's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Concerned Problems; Introduction of <i>Xinjiang Tongshi · Qing</i>		Qi Qingshun (131)
On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Four Files of <i>Xinjiang Tuzhi</i> and Its Versions	Jiang Xiaoli (159)	
Xiao Xiong and His <i>Tingyuan Xijiang Zashu Shi</i>	Wu Huafeng (183)	
Population's Flow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ity in Urumqi of the Qing Dynasty	Jia Jianfei (205)	
A Survey of the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Central Asian Archaeology Preserved in the Hoernle Library in Ōtani University, Japan		Wang Jiqing (219)
The Memory of Heinrich Lüders and Emil Sieg	Ernst Waldschmidt (tr. Liu Zhen) (243)	
The Memory of Lin Li-kouang	Paul Demiéville (tr. Pan Tao) (255)	

Prof. E. Waldschmidt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Philology and Art Studies of Ancient Xinjiang	Geng Shimin (267)
W. W. Radloff and His Turkic Studies	Zhang Tieshan (273)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ontents <i>Tyurklogicheskiy sbornik</i> (1951-2009)	Zhang Tieshan (281)
Expedition to Central Asia and the Discovery of Early Medieval Turkic Manuscripts	L. Yu. Tugusheva (tr. Yang Fuxue & Zhang Haijuan) (303)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i>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i>	
Anatoly M. Khazanov (tr. Jarken T.) (311)	
Contributors	(351)
Introduction to the <i>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i>	(352)

罗布淖尔考古与楼兰—鄯善史研究

王炳华

引　　言

《史记》、《汉书》中记述西域小国“楼兰”、“鄯善”，语焉不详。随历史长河流泻，时过境迁，至20世纪初，除了少数专事西域研究者外，中外史学界对地处偏僻的新疆，对新疆沙漠中这些短暂显示光辉的弹丸小国，已少见关注。

真正使楼兰、鄯善进入国内外学术界视野，是在20世纪帷幕初揭的1901年。这一年，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古城废墟，并在楼兰古城内发现了多件记有“楼兰”字样的汉文、佉卢文木简和纸质文书。1906年12月，A. 斯坦因在充分准备之后，进入罗布淖尔荒原及楼兰古城。他雇用数十名农工，在楼兰挖掘了十一天，获取大量文物，同样有多件涉及“楼兰”的文书。

继斯坦因之后，1910年大谷探险队进入新疆。橘瑞超在楼兰城中发现了“李柏文书”，史料价值一流，但出土情况却没有记录。

西方列强对西域大地，包括楼兰等遗址的考察、发掘，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觉醒、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后，被迫终止。但当年中国学术界，自身也还没有力量单独进行西域考察活动。

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在罗布淖尔荒原尤其是楼兰、米兰的考古，对相关文物考古遗存造成了巨大破坏。但在西域历史文化研究上，也取得十分重要的收获，有其奉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清楚揭明：中亚腹地沙漠深处的这些古代遗存，如其中西亚艺术风格的绘画、雕塑，佉卢文木牍及其封泥上的希腊神像，贵霜钱币，佛寺中的有翼天使像，波斯风格的玻璃器残片等，显示了来自古代波斯、中亚希腊化城邦的文明信息，它们与大量汉文简纸、丝绸、漆器、铜镜、五铢钱一道，呈现了黄河流域古代文明与亚洲西部大地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的景象——而这一点，正是亚洲内陆腹地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无疑为中亚古代文明研究，展示了一个新的方向。

对罗布淖尔荒原、楼兰古城等重要遗址展开进一步考古，时在近50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至于今，对这片地区的工作，包括文物普查、遗址保护、抢救性发掘等，未稍停息，获得了重要的、远远超过既往的文化成果。

1979年，因应形势要求，新疆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30年代停止了这些地区的考古后，重又进入了罗布淖尔，重新觅见了楼兰故城、发现了古墓沟、清理了当年斯

斯坦因只做了一半的汉代墓地；再一次清理了汉、晋西域长史府故址中一处垃圾堆。继此以后，调查、验证了斯坦因当年足迹所及的墓地、遗址，清理了 LE 墓地、发掘了营盘古墓区、全面发掘了小河墓地，对米兰遗址也做了深入一步的调查。最主要的是发现、测定了伊循一处古代灌溉水系，在米兰河北岸台地发现了一处汉代遗址。这些工作，虽不能说是有严密的计划（如按照古代水系进行缜密调查），一些发掘清理，也只是在打扫盗墓之劫余（如 LE 古墓地），但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对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也取得了超过当年 E. 贝格曼局部发掘远为丰富的文物资料，使分析研究的可能进一步扩大、深入。

近 30 年的罗布淖尔考古，结合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沙漠、地理、水文、气象、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这片地区多次综合考察所取得的成果，促使历史考古学者深刻思考一个问题：并不太长的一千五百多年，曾是丝绸之路要冲的罗布淖尔大地、楼兰绿洲，怎么就化为了一片没有生命的荒原？烟波浩渺的罗布淖尔湖，竟然成为滴水不存的盐漠荒滩？古代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在地球生态危机日益明显的今天，认真剖析楼兰绿洲从兴盛走向绝灭的过程，全面检视人类社会活动与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间的关系，吸取一切可能吸取的历史教训，是应该、也必须提上日程的研究课题。这可以较 20 世纪 30 年代前通过这些遗存，只关切其中的点滴文化遗物，可向前大大跨进一步。

笔者自 1979 年衔命步入罗布淖尔，至 2005 年自楼兰东走敦煌，26 年中，因责在新疆考古，先后进入罗布淖尔荒原达八次，时间最长者在一个月以上。其中，因应工作要求，自米兰入罗布淖尔湖盆，进楼兰、土垠、龙城雅丹，缘库鲁克塔格山入尉犁、库尔勒，或反向行进，到米兰后，经库若公路（库尔勒—若羌）返抵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这类活动不少，惜每每多只是循点前行，做规定要做的几件事，如是反复进行，对深入一点认识相关遗址内涵，当然很有好处，但却没有能进行更细致的考察，留下了遗憾。

1979 年入罗布淖尔，是应中日合拍“丝绸之路”电视纪录片之要求，要找到一处古代楼兰王国境内的古墓地，实施发掘。最好能发掘到一具保存还完好的楼兰大地古尸，一显古代罗布淖尔居民的风采。这是 CCTV 为我们办理进入楼兰考古工作手续的条件（当年这片地区仍为军事禁地，这才有了考古工作者进入考古还要电视台办手续的怪事）。应约在先，自然不能食言。为此，我领着所内一些同事，在孔雀河下游河谷台地上辛苦工作了一个多月。库鲁克山中极其干燥的地貌，孔雀河谷已经断水，但偶尔还可遇见未完全干涸的水塘，河谷两岸胡杨、芦苇、红柳丛生，野兔、黄羊出没的景象，仍如在眼前。孔雀河谷下游鳞次栉比的雅丹，河谷北岸偶遇的孤立汉墓……无不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再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 2000 年 12 月，寻找已没有任何消息近 70 年的小河墓地。受工作经费之限，一行十人，选择自库鲁克塔格山南麓，直对小河墓地的方向行进。驼行与步行结合。经过四天，天佑人助，竟然基本无差地步入了小河墓地。这四天，途中有河滩，有倾仆在地、两人不能合抱的胡杨，林中水塘周围，密如繁星的兽蹄印迹（都是求水而至此），红柳、芦苇、连绵的沙窝，其中也见到石器、陶器，是还未

进入文物考古工作者视野的历史遗存。孔雀河下游，古代曾是水丰草茂、充满生命活力；而断水后沙化，生物绝灭，人迹难至。这些景象，清楚呈现在眼前。这次寻觅小河之行，找到了小河墓地，是计划中的收获。而途中的景象（包括人类活动遗存）却给了我强烈提示：要真正把罗布淖尔地区古文明遗存、变化完全搞清楚，现在考古工作，只局限在孔雀河下游三角洲，而且基本没有离开斯坦因当年发现、考察过的一些遗址点，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是存在很大局限、并不完全合适的。

更值得一说的考察，是 2005 年自米兰绿洲北入楼兰、土垠、LE 墓地、龙城雅丹后，东过白龙堆，穿过罗布淖尔湖盆东岸，经库木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甜水井，过库鲁克山尾闾，进入疏勒河谷，历三陇沙，叩玉门关，入敦煌城。近一周的跋涉，走的就是汉代戍边健儿们自河西走廊西入楼兰绿洲的道路。这道路，只能算是一个行进的方向。途中沙泉、砾漠、雅丹、盐湖相继，少见水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十分艰难。汉代戍边健儿们在出敦煌、向西域，进抵罗布淖尔湖北岸后，必须努力建设一处相对安全、可以停息、补给的基地，这要求会是十分、甚至是极其紧迫的。它关乎使节、吏士的生存、安全，关系开发西域大业的成败。对西汉土垠遗址的重要地位，由此得深切体会。有无这番体验，感受是十分不同的。

自 20 世纪初至八九十年代，罗布淖尔、楼兰，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荒原上的早期文明，楼兰的兴起和沉落，斯坦因编定的 LA 古城，究竟是否楼兰古都，罗布淖尔湖曾否游移，以及古墓沟墓地的年代，小河墓地的文化内涵等，有过不少次讨论热潮。笔者除报道过古墓的发掘，写过一些介绍性的文字外，始终未就上列研究热点发表过论文。按一般情势，在有过对罗布淖尔荒原环境、古代遗存这么多次的考察后，是可以说一点意见，也是可以提出一些具体观点的，笔者自然也不例外。只是有感每次观察还有未到之处，一些遗存中细节结点，还总感可以争取下一次看得更深一点、更全一点；甚至内心深处还埋藏着对一些遗址点组织进行发掘的愿望。但天不遂人愿，它们都未能实现。于是，一些想说的观点就牵延至今。

现在，自感年事渐高，毕竟已经 75 岁。虽腿脚仍健，但独立进入罗布淖尔荒原，再细细斟酌一些遗存，不是容易实现的计划了。故而决定将这二十多年中在罗布淖尔荒原考察、研究之心得，稍予梳理，条列于后。这对并未止息的楼兰古代文明研究、罗布淖尔地区文物保护等，或有一点用处。

一、孔雀河是楼兰文明的母亲河

一百多年的罗布淖尔考古，发现过不少遗址，取得了许多在研究古代新疆史、亚欧内陆文明史时，不能无视的珍贵文物。今天，总结性的观察，可以明白结论：这些大大小小的遗址，不外乎分布在若羌河、米兰河、孔雀河三条水系内。而其中，尤其是孔雀河水系，最具重要地位。只有它，才是罗布淖尔新石器时代之细石器遗存、青铜时代遗存、汉晋时期遗存集中分布的地带。古代罗布淖尔荒原的历史文化中心，只有孔雀河水系当之无愧。作为罗布淖尔荒原古代政治、经济中心——楼兰，只能生发在这一水系

上，很难想象有另外的合适地理处所。

位居新疆东南部的罗布淖尔荒原，海拔不过780~800米。而西邻的塔里木盆地，海拔高度却在800~1400米之间。塔里木盆地西缘为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塔里木盆地内众多的内陆河都自然流泻向罗布淖尔荒原，并汇聚而成烟波浩渺的罗布淖尔湖、台特马湖、喀拉库顺湖。塔里木河、车尔臣河、孔雀河是它们最主要的补给源。

孔雀河源于北天山南坡，上游为开都河，汇入博斯腾湖后，下泄到罗布淖尔，这一河段，称为“孔雀河”。孔雀河自博斯腾湖下泄，河口蚀穿天山支脉霍拉山，形成长约40公里的铁门关峡谷。晋代称此峡谷为“遮留谷”（《晋书》卷九七《四夷列传·西戎·焉耆》），两岸悬岩壁立，地势险要。唐代诗人形容它是“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岑参《题铁门关楼》），水势十分湍急。但越过铁门关，经过库尔勒，进入塔里木盆地后，水势变得十分缓平。由库尔勒斜向东南，慢慢流泻至罗布淖尔湖，全程长约500公里。这一流程中，两岸胡杨屏列，红柳依依，芦苇茂密，水色清碧幽兰，绝无沙河混浊之景，故而汉语称之为“孔雀河”。孔雀河河谷两岸，成为罗布淖尔荒原早期居民最为理想的生息处，是有比较合理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条件的。

迄至目前，在孔雀河水系内，已经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其晚期迄汉、晋时期城镇、墓地、仓储、烽燧、佛教寺院等各种遗存不下百处^①。黄文弼在孔雀河北岸、库鲁克山南麓的英都尔库什、阿尔特密西布拉克，斯坦因编号的LE、LF、LI，贝格曼在小河以东的雅尔丹布拉克，霍纳尔、陈宗器在楼兰地区周围发现石器遗址点多处，新疆考古所王炳华、侯灿、伊弟利斯、常喜恩、邢开鼎等，多次在楼兰城周围采集到比较多的细石片、石簇、玉斧，在老开屏采集到大量打制石器。配合石油物探，在孔雀河下游河谷地带，也发现多处细石器、小型玉斧、玉簇。这大量考古资料表明，至少在去今一万年前，在孔雀河下游三角洲地带，新石器时代以细石器工具为特征的人类遗存，在孔雀河流域是普遍存在的，它清楚地显示了这片地区当年曾是水草丰美、树林茂密、野兽出没，适宜于人类狩猎、采集活动的处所。而在这众多的遗存中，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上的楼兰城内及城周围，几乎每次、每个探险队员都曾经觅见不少打制石器。这表明在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从新石器时代起，楼兰故城所在，一直就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点^②。

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目前可见主要为墓地。古墓沟、铁板河、小河以及斯坦因发现的LF、LQ、LS、LT等处墓地，LE古城东北数座墓葬，除小河墓地位于孔雀河支流上，其他几处墓地，都在孔雀河北岸台地及孔雀河尾闾地带。墓地位置较高。墓主人生前居址，至今没有发现。但他们以孔雀河河谷为生存活动之依托，从墓地观察，自然也是没

^① 见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国立北京大学，1948年；A.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新疆文物考古所自1979~2005年间历次调查资料；夏训成主编《中国罗布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412~415页。

^② 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有问题的。

汉晋时期的遗址，主要也分布在孔雀河谷及河流下游三角洲地区。LA，可以确定无疑的结论，这里就是西汉前期的楼兰王都^③，后为汉—晋长史府驻节地——这时原楼兰在西汉王朝直接指挥、控制下，已迁都到若羌河畔绿洲之扞泥，更名“鄯善”。所以汉文史籍中，也称这里为“故楼兰”；以位置濒临罗布淖尔湖，又俗称为“海头”（说详后）。在楼兰古城南面的LK古城，东北方向的LE古城，与楼兰成掎角之势，军事上可以互相呼应，成为一个防御整体。逻辑推论，LK、LE，应该是西域长史府属下之戊校尉、己校尉驻地。他们分别控扼自吐鲁番盆地车师王国南下、阿尔金山脚下鄯善王国北进的径道，保证了西域长史府左右的安全。由LE更西，沿孔雀河西行，还有汉—晋时期的营盘古城，它居于孔雀河北岸，但却依凭新地沟水而生存、发展，它是墨山国都城故址^④。

自楼兰故城LA沿孔雀河谷西走，在孔雀河北岸、库鲁克山南麓，有东、西方向一线铺展的汉代古烽近十座：孙基、亚克伦、卡勒泰、西尼尔、脱西克吐尔、沙鲁瓦克、萨其垓；另在兴地沟南口，还有南、北方向古烽一列，清楚可见者有三座。前者通轮台，后者向车师，保存还基本完好。楼兰作为汉王朝西出玉门关后的交通枢纽地位，于此可以得到清晰的揭示。

沿孔雀河谷西行，是汉王朝交通西域都护府的要道。屯田、仓储、邮传，均属要务。坐落在孔雀河尾闾的土垠遗址，据出土西汉木简，它是文献有征的“居卢訾仓”故址，作为重要仓储地，附近曾置屯田。这里同时又是联络敦煌的邮置所在^⑤。

在楼兰古城中及城东北、城西均见佛寺。LB聚落中，佛教寺院具重要地位。楼兰故城，作为孔雀河绿洲的中心，当年是这片地区人烟稠密，经济发达之区。这为它成为汉晋时期佛教昌盛之地，准备了经济、社会基础。

在楼兰故城东北约五公里处，笔者还发现砖窑两区。灰砖仍显于地面。现存古城遗址，未见以砖为建筑材料，但这砖窑、灰砖风格，确为汉—晋时代遗物。这一遗存，从又一角度表明了LA古城当年具有不同一般的地位。

由此可以得到的认识是：以孔雀河水系为地理基础形成的绿洲，是罗布淖尔荒原上开发时间久远、人烟比较稠密、濒临罗布淖尔湖的最大一处绿洲。在西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边的内陆河上，曾有不少散列的绿洲。一个绿洲，不论其大小，往往就是一个经济实体，一个政治单元，是中原史家笔下大小不等的王国。孔雀河下游三角洲的楼兰，自然也是一个王国。国家的名称，据出土之佉卢文木牍，其自称为“KRORAINA”，也就是汉文译称之“楼兰”。

楼兰，《史记》、《汉书》中强调的一个最根本特点，就是“临盐泽”。这濒临盐泽的绿洲，最主要、规模最大的一处，只能是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上的楼兰。它是自新石器

^③ 黄盛璋《楼兰始都争论症结难解与LA城为西汉楼兰城新论证》及《续编》，《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1期，61~74页；2002年第2期，72~80页。

^④ 李文瑛《营盘及其相关遗址考：从营盘遗址非“注宾城”谈起》，《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68~75页。

^⑤ 王炳华《土垠遗址再考》，《西域文史》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61~82页。

时代、青铜时代，以至汉晋，始终居民不断、垦发不停的经济中心。古代楼兰王国，不在这么一处水源稳定、农牧均得其便的绿洲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离开这一得到水源、经济支持，濒临“盐泽”、位置靠近车师与敦煌的绿洲，而去阿尔金山脚下的若羌觅求“楼兰”，是让人无法理解、结论也无法让人接受的。

二、楼兰都城，从地理位置、遗存特征、 已见文物，就在 LA

LA，是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上最主要的经济中心，位置最近敦煌，濒临罗布淖尔湖，居于湖之西北部。参照《史记》、《汉书》有关楼兰之纪录，说楼兰位置“临盐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判定它就是古楼兰王国之都城，可谓持之有故，顺理成章。

1901 年、1906 年斯文赫定、A. 斯坦因在 LA 城获汉文、佉卢文文书，文中有“楼兰”\“Kroraina”。所以希姆来、斯坦因、沙畹，均判定此城为西汉“楼兰”。“Kroraina”即为“楼兰”之原音。但自 1914 年王国维在未能获见主要出土文书资料的情况下，首先否定 LA 古城为楼兰国都，提出古城为前凉之“海头”起，近一个世纪以来，又因 LA 古城中出土文物多属东汉魏晋时期，并不能与西汉前期楼兰国相关联，引发更多议论，如楼兰都城在扞泥说^⑥，楼兰始都 LE 说^⑦，等等。具体根据，除上面提到的遗迹、文物晚于西汉一点外，也有在译读佉卢文 KH696 号文书时的不同见解。

对这些歧见，黄盛璋在他近年刊发的《楼兰始都争论症结解难与 LA 城为西汉楼兰城新论证》及其《续编》中进行了清理、剖析，对 LA 古城为楼兰都城所在，可以说已进行了比较全面、多方面的论证。黄文的结论应该是比较充分而有说服力的；对第 696 号佉卢文书的文义，也作了合理的辨析，这里不作赘引。

笔者作为专事新疆考古的学人，多次在罗布淖尔荒原考古，并深入楼兰古城中进行过考察，对 LA 古城所在地理形势深有了解，可以从考古遗存角度对此稍作补充。

前面提到《史记》、《汉书》在涉及楼兰时，都强调它“临盐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城址最近敦煌、又临罗布淖尔湖，“当白龙堆”（白龙堆，就在罗布淖尔湖稍东北处，笔者曾经身历。由敦煌至楼兰，白龙堆是必经处所，所以称“当”），这样的古城，只有 LA 可以相当。地处若羌的扞泥故城，与“盐泽”无涉，不算“近汉”，不“当白龙堆”。LE 古城位置与 LA 近，但城内只见一区遗址，这与先为楼兰国都，后为西域长史驻屯地的楼兰故城，也不能统一。

班超之子班勇，出生、成长在西域大地。他对西域大地的地理、政治形势了如指掌，是当年东汉王朝熟悉西域地理、政治形势的第一人。东汉元初六年（119），邓太

^⑥ 马雍《新疆所出佉卢文文书的断代问题：兼论楼兰遗址和魏晋时期的鄯善郡》，《文史》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收入作者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89~111 页。孟凡人《楼兰新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年。

^⑦ 林梅村《楼兰国始都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279~289 页。

后“召勇诣朝堂会议……勇上议曰……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按，此时，楼兰王国早已迁都于泥），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⑧。著录于《后汉书》的班勇建言，可注意之点有三：第一，他将楼兰与鄯善并列。说明东汉时，在楼兰王国迁都鄯善后，楼兰国虽已不存，但早已熟稔于人心的“楼兰城”，人们还是习惯在使用的；第二，班勇强调指明，楼兰城是“西当焉耆、龟兹径路”，这只有现在的LA古城可以相当。汉代，从LA西走，沿途烽燧相续，至达焉耆、龟兹。如果换了若羌绿洲上的于泥，就完全说不通了。第三，有一支汉军驻屯在楼兰，对一心向汉的南道诸国，如阿尔金山脚下的鄯善、昆仑山北麓的于阗，军事上、心理上，会是有力支持。这样做了，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丝路干线，可得畅通。这就十分明白地说明了楼兰、鄯善是南北分列的。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判定LA为故楼兰城址，还可以《三国志·魏志》所引《魏略·西戎传》中相关文字为据：“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由此可以看到，故楼兰城是与龙堆紧密毗邻、联系在一起的。所谓“龙堆”，就是罗布淖尔湖北面的雅丹群。过这片雅丹到LA城，距离不过30公里左右，一站驿程。这里的“故楼兰”城，只能与LA相当。

据上引《史记》、《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魏志》、《魏略·西戎传》的相关文字，可以看到在两汉、三国之时，中原大地人们对故楼兰城的位置是相当清楚、明确，不稍含混的。在魏晋南北朝相当时段的断裂、分隔后，中原与西域大地联系疏于两汉，相关文献就有不少混乱不清之处了。

这些早期文献记录，可以说明楼兰故城确与罗布淖尔湖西北之LA古城遗址相当。此外，从LA古城现有遗迹，也可觅得早于汉一晋的早期文化层。目前的考古工作实践，并不支持做出古城遗存、出土文物全部都在东汉以后的结论。

对楼兰古城的发掘，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无序、混乱，不符合考古学发掘规程的。斯文·赫定1901年进入楼兰LA后，兴奋异常，所带农民工，只要获得文书，即有金钱犒赏。在工作进行的十一天中，农民工就在城内有数的几处居住遗存中，各展其能，随处乱挖乱掘；1906年，斯坦因进入LA，同样如是。他重点在西域长史府故址、三间房西侧的垃圾堆中进行发掘。虽然他同样没有对这一遗存认真清理，谈不上到达文化层底部，而只为得到“很多写在木板同纸片上的中国文书”，“写在木板、纸片以及绢上的佉卢文书”，再有一件粟特文残纸，就十分满足了。1980年，新疆考古所在楼兰城调查、试掘，也有探沟处于这一垃圾堆上，探沟同样没有交代文化层情况，只说“发现残木简60枚，纸文书一件”^⑨，而这处垃圾堆，笔者多次仔细观察，实际至今并未有完整、严谨、科学的清理。笔者在调查这区遗址时，还发现过一处遗存叠压现象。它位于汉、晋时期西域长史府西北角建筑遗存之下，深度1~1.2米后，明显可见一片早期文化层：它东西长近两米，厚20~40厘米。从只暴露一点的剖面观察，文化遗物有草屑、

^⑧ 《后汉书》卷七七《班勇传》。

^⑨ 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5页。

骆驼粪、兽骨片、烧炭碎粒，未见陶片等物。但它是深压在东汉、晋时期文化层下面的早期遗存，则清楚无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一文化叠压关系，虽未在正式报告中披露过，但现场情况，曾不止一次向学界同人介绍过。至于这一文化层，是否确早到西汉前期，甚至更早，它包含怎样一些考古文化内涵，则只能期待今后新疆考古学者进一步发掘的资料了。

楼兰故城（LA 遗址）现存遗迹可搜寻到早期遗存，还有一个线索。认真观察 LA 古城城垣遗迹，可以清楚看到相关建筑存在不同特色。如，除红柳、苇墙的建筑外，还有土建遗址。而土建遗存，又有土坯与垛泥版筑之别。出土了大量魏晋时期文书的西域长史府故址（以“三间房”为代表，斯坦因编号为 LAII）的建筑物，有比较坚固的土坯房屋。土坯规格分别为 $42 \times 23 \times 10$ 厘米、 $47 \times 27 \times 10$ 厘米。土坯宽大、致密，经历一千六百多年罗布淖尔荒原东北季风吹蚀，至今保存基本完好。曾经使用了土坯的建筑物，除三间房，还有古城东北佛塔、古城西北郊古烽、古城东墙外一区巨型军事防卫性质的建筑（高达 10 米），这类建筑物，从三间房曾出土最晚到北凉时的文书，可以结论，它们都是古城中的晚期遗存。

与这种土坯建筑形成最明显对照的土建遗存，是垛泥构建的古城墙。楼兰城墙，保存十分不好。但只要认真辨析，略近方形的土建城墙，虽不少地段已被风力夷平，但断续相继的残存墙迹，还是可以约略看清。张骞在第一次西域之行返回时，观察到“楼兰姑师邑有城廓”（《史记·大宛传》）。所以，楼兰城之始建，是早在西汉王朝通西域之前的。现存城墙，确也清楚显露早期比较粗率、比较原始的特征。笔者曾多次对楼兰城墙细作观察，可以肯定说，它绝非“夯筑”^⑩，也并不是如疏勒河一带长城所见一层芦苇、一层土，十分平整有序的形象。而明显是垛土筑墙的成果。垛泥层厚薄不一，厚度分别有 15、45、60、70、80 厘米，真正是厚薄不均。土层之间，一些地段，可以看到夹杂红柳、芦苇。但并不见平均铺展^⑪。正因如是粗率，难经长期东北季风吹蚀，所以保存甚差。进入楼兰遗址之中，不仔细搜寻、观察，一般都难见到古城墙痕迹，其原因正在于此。新疆地区已经发现的与古楼兰城背景相近的相关古城遗存，如尼雅遗址所见两座古城（N2 附近，及尼雅南城）、克里雅河下游之可早到西汉（或更早）的圆沙古城，都可以发现相类似的特点。垛泥筑墙，这自然是比较原始的特点，也是新疆地区最早期古城的特色，与汉代红柳和夯土相继的建筑工艺，是明显不同的。

与楼兰城墙垛泥筑法相比较，在西汉统治西域后，在中原王朝主导下修筑之城堡，工艺有了全新的发展。这可以举两个实例作具体说明。一是与楼兰古城相去只 23 公里的土垠。土垠遗址内，出土过 72 支西汉木简。其中 3 支有西汉纪年。这是在公元前 1 世纪西汉王朝经营楼兰时修筑的一处前进基地，用为仓储、邮置^⑫。土垠遗址保存已不完好，东墙、南墙已遭毁损，但西墙、北墙之西段却仍然保存完好，特征鲜明。笔者调

^⑩ 穆舜英《神秘古城：楼兰》称“在间隔厚八十厘米的夯土中夹压芦苇秆和红柳枝”，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年，88 页。

^⑪ 参见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7 期，5 页。

^⑫ 王炳华《土垠遗址再考》，同注^⑤。

查记录，它们是高仍1米上下的夯筑土墙。夯层厚8~10厘米，墙体平直，至今仍相当严实。西汉时期，筑城用夯，是一个明证。二是东汉时期耿恭苦守的疏勒城，位置在今天山北麓奇台县南郊的石城子。它是为保卫、控扼匈奴南入吐鲁番一条径道而修筑的军城。古城依山，东侧临深涧，北、西、南部却是夯土筑就的城墙，夯层厚10厘米左右。这座军城东汉时在匈奴的强攻下被毁。其时代与土垠一样，比较单纯，也可以做出明确结论：东汉王朝时修城，也是严密夯实的土墙，而绝不是比较粗疏、简陋、相当原始的垛泥垒土。

与LA楼兰故城不同，处于西域长史府直接控制之下的、同一地区的LE古城、LK古城，使用的方法才是一层红柳、一层土，平整均匀、经过夯实的土城墙。它们与LA城墙垛泥法同样明显存在差异。LA垛泥城墙，具有早期的、比较原始的特征，时代早于西汉，是可以从逻辑上推定的。

楼兰故城城墙，部分墙段（如东墙中段，南墙局部）在垛泥时，土层中夹有芦苇、红柳，这些是可以用作测年的良好材料，用这些物料进行¹⁴C测年，对判定古城修建年代，可提供比较理想的数据。希望这一工作在今后的新疆文物保护工作中可以进行。

三间房西北地层剖面上，可以清楚观察的早晚文化层叠压关系；楼兰故城土墙构筑工艺明显具早期、原始特征。强调这两点，意在说明：我们今天还不能以十分不完备的楼兰城考古工作为据，就判定这座古城不可能早到西汉、西汉以前。它的城墙，就是明显具有早期特征的最大文物遗存之一。古城中文化层在近两千年的厉风吹蚀中，确已消失近尽。但进行严格的、科学的发掘，很难说就不会在魏晋遗址下面找到西汉或较西汉更早的楼兰文物的。因为从斯文·赫定、斯坦因到我们自己，至今一百多年，确实没有在这里进行过严谨、科学的发掘。即使是东汉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故址，至今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测图，还总只是以长史府一角的“三间房”说事，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在以保护为前提的方针下，我们过去没有规划、安排这一工作，这是一个要吸取的教训。笔者曾在不短的时段中主持过新疆考古所，当年虽有过此心，但也没有提出、坚持要求在楼兰城中进行适度的科学发掘，今天想起来，确感遗憾。

明明古城仍沿称楼兰，前凉之西域长史李柏在致焉耆王的信函中，却要强调说明信函写在“海头”。这是一个小的悬疑，有可能是事涉军事机密，有保密之需，故布疑阵；也有可能故意标新求异，示亲切、求风雅。但不论如何，当年的前凉西域长史，就驻节在古楼兰城中，西汉楼兰王国早已不存，但楼兰城却久蓄人们心头，并未因国灭就消失城名之影响。LA古城，就是西汉时期的蕞尔小国楼兰之都城所在，今天就已有之考古资料，是可以得出这个肯定的结论的。

三、去楼兰、立鄯善、兴屯田，汉王朝 强化开拓、统治西域大业

自张骞通西域，至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西域大地进入西汉版图，半个多世纪

中，新疆大地，政治形势可以说是风云激荡，变化迅猛而深刻。这一过程中，楼兰由于其特定的交通冲要地位，始终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

公元前 176 年，匈奴进入西域，击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傍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史记·匈奴列传》）。因此，公元前 2 世纪末西汉通西域，形势是复杂而艰难的。匈奴控制着天山以北广大地区，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王国也程度不等地隶属于匈奴。刘彻雄才大略，确定通西域战略后，不论形势如何险恶，坚持初衷，面对不同环境，采取不同策略，区别对待，“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汉书·西域传》）：大宛与汉王朝对抗，阻绝汉通西亚径路，就不计困难，倾力动员，远征大宛；乌孙虽属匈奴，但又与匈奴有隙，则厚赂以结乌孙，嫁细君、解忧，使乌孙离匈奴而亲汉；小国仑头不自量力，全力对抗，不处置将误大计，即予屠灭。楼兰，则为又一典型。

楼兰是一个蕞尔小国，但地理位置却十分冲要。它最近汉、控扼汉王朝进入西域的咽喉，汉王朝必须周全处理，不留隐患。如何面对汉王朝通西域的这一新形势，同样是楼兰统治集团面临的全新问题。历史进程表明，它们既不能正确估计内外形势变化，也完全没有驾驭这一事变的能力。

汉通西域之初，楼兰已在匈奴统治之下六十多年。匈奴在楼兰大地的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影响，是不可轻估的。只从军事上看，匈奴游骑从伊吾（哈密绿洲）、车师（吐鲁番）入楼兰，或由匈奴控制西域的“僮仆都尉府”驻地（今库尔勒一带）沿孔雀河入楼兰，均相当便捷。楼兰很难摆脱匈奴的军事控制。

军事上受制，政治依附，文化相通，经济上不仅感受不到开通欧亚大陆交通路线的利益，而且徒增许多负担，这就使楼兰对汉通西域难有热情。张骞自中亚返国后，汉“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史记·大宛列传》），居于交通孔道的楼兰，负水担粮，负担沉重。因而，楼兰采取了追随匈奴与汉王朝对抗、破坏汉通西域的方针。“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而且，它“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公元前 108 年，面对这一形势，刘彻命令王恢伺机“击破”楼兰。这是西汉王朝与楼兰第一次冲突。楼兰受到打击，表示“降服贡献”，但矛盾实际并未解决。

汉与楼兰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李广利征大宛之时。公元前 104 ~ 前 103 年间，李广利征大宛。匈奴感到威胁，但无力正面阻击；采取了“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将楼兰拖下了与汉朝对抗的泥潭。西汉王朝又一次“捕楼兰王，将诣阙，薄责王”，将楼兰王表面臣服、背后做的一件件阻抑、破坏汉通西域的事实，摆在了他的面前，要争取楼兰改变亲附匈奴的初衷。楼兰王道出了苦衷：“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人居汉地。”说的是实情。西汉王朝这次没有进一步苛责楼兰，而是让楼兰王返回，要求他同样为汉王朝“候伺匈奴”。疏离楼兰与匈奴的关系。这是汉与楼兰斗争的第二回合。

西汉王朝对如何处置楼兰，是十分用心的。楼兰只是西域东部的弹丸小国，地理环境寒苦，“乏水草”，对导引汉使，供应水、粮、草料，难胜负担；此外，也还有“吏士”在需求不能满足时的盗扰，因而总是心向匈奴，提供情报；并曾先后“遮杀”过